

高占祥先生毕生热爱文学,1985年即加入中国作家协会,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,为表达对高占祥先生的缅怀之情,特刊发他的一篇散文作品如下。此文写于2014年3月。

——编者

一个人的人生,既不能由命运的权柄完全操纵,又不能仅按照个人的意愿航行。人生的魅力在于孕育无数的可能,酷似一个人与命运对弈而布成的一盘棋。我从童工到部长是这样,我从草根逐渐走上文学之路也是这样。这么说也许不恰当,但不过是一个比喻而已。

严格说来,我还不能说已经走上了文学之路,而是正在文学的路上行进之中。故在此只能谈四点粗浅的感受。

一、痴迷学文是踏上文学之路的垫脚石。

学文识字是从事各种文学门类最基本的前提,是能否走上文学之路的关键。而我只读过五年小学,这是我从事文学的致命弱处和最大障碍。

1953年,我进入北京印钞厂当排字工人,同时被厂里选为宣传员,负责写黑板报、宣传栏反映厂风厂貌。结果本来很生动的好人好事被我写得干巴巴且词不达意、错字连篇,闹出不少笑话。当别人叫我“错字大王”时,我羞得无地自容。这种针扎似的刺激变成了我“不攻破文字关绝不罢手”的决心。我暗暗发狠:不摘掉“错字大王”的帽子,我就不姓高。于是,我搞了一场自我识字的“攻坚战”:申请到业余学校补习中学功课;到书店买来字典,一字不漏地读字典、背字典;每天早晚读古诗,背古文;后来又上了七年北京红旗业余大学;还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业余艺校学了几年,其间让我收获最大的是听老舍、侯宝林、郭小川等名家讲文学课。

那会儿打文字攻坚战的时候,真是风雨无阻,雷打不动。



我的文学之路

回高占祥

连结婚那天晚上,我都背着书包去夜大上学了。正因为自己文化底子薄,才知道文字的重要性,感受到夯实文字基础乃是搞好一切文学艺术的基石。

二、苦读语道是迈向文学之路的阶梯。

多读书、苦读书、善读书是非常重要的,但更重要的是要从中悟出新的道理来,并且把它用到生活工作和文艺创作中去。这样悟出的作品方能具有仙气、灵气和朝气。

我在学文艺创作的初期,着重学文学的用词和创作技巧,逐渐理解“文学即是人学”的道理。文学创作技巧固然重要,

而更重要的是在作品中融入作者的真挚情感。我很欣赏孙家正同志在《艺术的真谛》一文中所讲的一段话:“在人们的精神世界中,或者在文学的结构里,情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。它虽然属于感性的范畴,却是一切理性的源头和基础,这就是古人所说的‘道始于情’的道理。”

的确是这样,在联合国举办的一次主题为“我的母亲”的征文活动中,我参赛作品题目是《别梦依稀慈母情》。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,当我回忆自己生病之际,母亲含着泪水为我四处求医寻药的情景时,我的泪水不停地滴落在稿纸上,中间

灵芽出桐木

回奉荣梅



公路劈开森林,蜿蜒的九曲溪与白云蓝天引路,开往武夷山国家公园的绿色深处。当桐木村高大的标牌闪过时已是黄昏,一片小小的绿色茶叶,在路牌顶端高高飘扬,张扬着武夷红茶的发源地与原产地的深厚底气。

夜宿的三港,是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腹地,三条小溪于此汇流,形成一个小谷地。这里是九曲溪的上源桐木溪,水底清浅,山溪冲刷着裸露的各色石头,清越之声在河道与山谷间轰然。三港在武夷山南麓,海拔大概900米,后半夜温度会降至十几度,将山外暑气隔绝。

三港自然村也是桐木行政村所在地,村部就在管理所背后的山坡上。沿着桐木溪拾级而上,路边的野花,村舍屋后的芋叶、瓜藤,在路灯下摇曳。一条不过三四百米长的老街,沿坡而上,街边门面大都灯光闪烁,50多户人家,200多人口,除了种茶卖茶,还经营避暑客栈。硕大的密集炸开的玉簪花最是惊艳,“沉香亭北倚阑干”,像是王母娘娘扔下的金贵玉簪,纯洁无瑕,暗香袭人。生命力极强的菊芋,“花开不并百花丛,独立疏篱趣未穷”,恣肆狂妄,高过人头,是夜色中的粲然黄花灯盏。这些山里人家门前大多多种养花草,与闪烁的茶厂、茶庄的霓虹灯光和谐互动,显示茶舍有着雅致的女主人。家家客堂间都有一张木质茶桌,随时冲泡着汤色红浓艳丽的正山红茶,一种丰厚的桂圆干似的干果甜香和明快而清爽的松烟香,在口舌鼻翼流淌,醇滑甘甜,味远而力厚,黏住路人的脚步。

村委会简陋的水泥结构门楼前有些热闹,有小卖部、麻将桌,路灯闪亮。门楼内宽敞的坪地上,兼着停车与歌凉功能,三五老人坐在木椅上拉家常,四五个孩童在投掷拖鞋玩比赛游戏,笑闹声打破山村的宁静。村部门前公开栏宣介桐木村的概况,27个自然村散落在南北长35公里、东西宽25公里的桐木大峡谷断裂带内,两千村民的生计就是依赖这漫山遍野的茶园与竹林。

高山云雾出好茶。桐木村森林茂密,植被丰富,山高谷深,保持着完整的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,形成了一个协调的生物链,各种生物之间互相制约,保持着一种平衡,茶树基本不受虫害侵扰。人在草木间,即为“茶”。桐木村目及之处,屋前屋后路边,只要有丁点空隙地,都被茶树占据,高高低低,在乱石间野蛮生长。我此行不仅是为观瞻方志中记录的众多名胜与历代骚人之吟咏,探寻桐木村红茶原产地的秘密,更想像一株武夷茶树一般,坐看谷起云岚、众鸟扑棱、蝶羽蜂鸣,在草木间自由自在地呼吸大山之息。

我没料到,在这深山里竟然遇见一座天主教堂。村部过道立着一块石碑:桐木天主堂,武夷山市级保护单位。过道后面突显一座哥特式建筑,圆拱形的欧式门窗透出昏黄的灯光,门户敞开。教堂门外悬挂着一架大铜钟,铜声清洪,音响数里。教堂内外乱石墙勾勒白线,内里三架六柱梁枋立柱支撑,人字顶为清漆木条铺陈,三组欧式吊灯,长排木桌椅,与木柱、顶棚色泽一致,映照着深黄柔和的灯光,格外静默安谧。教堂建于百年前,建筑面积265平方米,2000年修复,后又兴建神父楼,设施基本齐全。

天主教为何能于400多年前在武夷深山传教呢?这与当年西方梦寐以求武夷山探寻红茶的秘密有关。作为红茶贸易源头的桐木村,一直是欧美人好奇探秘的目的地。千山烟霭中,万象鸿蒙里,这个中国东南大陆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,几百年来吸引中外生物学家追溯而至,发现了模式标本达1000多种。这些西洋教堂正是当年外国生物学家收购标本的转运站。

武夷山深处的这座百年天主教堂,更是正山小种从大山漂洋过海走向欧洲、走向世界的一个历史物证。明代后期,荷兰人商船首次来到中国,将武夷红茶带到荷兰,然后又传入英国与欧洲各地。也就是说,在400多年前,对神奇东方物产充满兴趣的欧洲人,更喜欢上这款汤色红艳明亮的武夷红茶。英国人还赋予它优雅的形象与丰硕华美的品饮方式,这种优雅与华美,源于大山的质地与茶人的虔诚。这些从武夷山采下来的小小叶子,柔和芳香,口味清甜,曾经给英伦的贵族们带去了生活的快乐和健康长寿,又由此积累起了多少巨额财富。

桐木村境内的挂墩、麻栗、先峰岭、大竹岚等山高水冷的地方,处处都有人安家立业,以开山种茶为生,成为人烟聚集的村庄或茶厂。

可以想见,当年桐木村的茶业生产有多么惊人的规模。以茶为生的厂户(茶农)约有六七百户,每年红茶产量有30多万斤,制茶的茶庄茶行大小二三十家。每年惊蛰喊山祭茶之时,鸣金击鼓,鞭炮炸响,红烛高烧,牲性担醴公祭茶神杨太白君后,拥集的茶农同声高喊:“茶发芽!茶发芽!”桐木村的茶芽仿佛听懂了茶农的心声,在春雨云雾中,叶芽壮实起来,叶肉更醇厚了,等待着采茶妹的脚步与歌声。采茶、制茶工从相邻的江西陆续进到武夷山,一个茶季往往都有万余人。在海拔2000米的茂密森林中还能找到清代茶园的遗迹和废弃的老茶树,现今桐木茶园已退至海拔1200米以下地区。

桐木村茶人间,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:“生成的正山,做成的工夫。”武夷岩茶出现早,红茶的创制是一种偶然,但是这种偶然也包含着必然的因素。“正山”强调的是真正高山地区所产之意,其范围为以桐木村的庙湾、江墩为中心的方圆600平方公里,大部分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原自然保护区内。这些日子我们在黄岗山下的山峰、深谷中攀山探谷,以桐木村驻地三港为核心,辗转于庙湾、江墩、挂墩、麻栗等古茶乡,品尝到这一辈子最丰富的茶之盛宴,真是奢华的茶乡之旅。

桐木村东北5公里处的江墩、庙湾自然村,是历史上正山小种红茶的原产地和中心产区。江墩因江姓而得名,江姓自宋末定居于此,已有24代500多年,家族是世代经营茶叶的“茶叶世家”,有江润梅、江素生、江元勋等数代著名传人。在庙湾正山堂茶业公司的茶叶博物馆里,我读到了桐木村流传的红茶在一次意外中创制而成的故事。江氏先祖定居桐木关后代种茶,约在明末某年五六月间,时值采茶季节,北方军队路过庙湾时驻扎在茶厂,睡在茶青上,待军队开拔后,茶青发红,茶厂老板心急如焚,把茶叶搓揉后,用当地盛产的马尾松柴烘干。烘干的茶叶呈乌黑油润状,并带有一股松脂香味,可当地一直习惯于绿茶,不愿饮用这种另类茶,因此只能挑到45公里外的星村茶市贱卖。没想到第二年便有人给两三倍的价钱定购该茶,之后小种红茶更由荷兰人带到了欧洲,漂洋过海,成为西方世界的宠儿。

第三天傍晚,我们从海拔1400米的麻栗村问茶下山,到三港北面的江墩吃晚餐,乡野餐馆却叫一派洋的名字“巴顿”。巴顿饭店前方两百米过桥,有一座巨大的制作红茶的青楼,我们便顺着公路夜探青楼。

正山小种的制作工艺是比较复杂的,它分为初制工序和精制工序。初制工序就有茶青、萎凋、揉捻、发酵、过红锅、复揉、熏焙、复火、毛茶等九道繁琐工序。桐木关一带在揉茶季节时雨水较多,晴天较少,一般都采用室内加温萎凋,而加温萎凋都在初制茶厂的青楼进行。现在已不是制茶季节,一长排三层木构青楼在黑夜里十分静穆,在手电灯光照射下,我们摸索着进了青楼底层。最底层用于熏焙经揉过的茶坯,砌筑有几处烧柴灶火口,四壁码堆着松柴,通过底层烟道与室外的柴灶相连。二、三楼只架设横档,上铺竹席,竹席上铺茶,在灶外烧柴柴明火时,热气进入底层焙干茶坯,而余热则将二、三楼的茶青加温萎凋。茶青萎凋后,再进行揉捻、发酵、过红锅、复揉,之后将茶坯抖散摊在竹席上,放进青楼的底层吊架上熏焙,在室外灶膛烧柴明火,使小种红茶带有独特的松脂香味。熏焙干的茶叶经筛分拣,再置于焙笼上,用松柴烘焙,增进小种红茶特殊的香味,初制毛茶就完工了。之后,还要经过定级归堆、毛茶大堆、走水焙、筛分、风选、拣剔、烘焙、干燥熏焙、均堆等繁杂严格的精制工序。由此,正山小种红茶会有种浓郁的松香味即桂圆干味道,外形条索乌黑油亮,这时候才可将成品装箱。我打开二楼木门,阔大的空间里架设有木料,上面平铺着竹篾织成的篾子,常年的烟熏火燎,糅合渗透着茶叶汁液,使其乌黑发亮,呼吸之间还有浓郁、霸气的香气,是融合蜜香、薯香、花香、桂圆干香于一体的悠悠沉香。青楼乌黑的门板上,涂鸦的各种数字与打油诗,叠加着各色茶农某一刻的欢愉与忧伤。

三港桥头,耸立着一尊名为“人与自然”的雕塑,塑像为虎牛戏斗,牛喻地球人类百姓,虎系大自然精华,寓意人与自然和的和谐。我想起桐木村村干部杨洪斌说起的动物与人的几个故事。到村里经常来做客的是猴群与野猪,狗熊是稀客。高山田地少,村民见缝插针种的玉米和红薯常常被野猪拱食了。他打开手机中的一个视频,那是2019年9月监控拍摄的一只狗熊半夜到桐木关双泉寺偷蜂蜜,守庙的老人被惊动出来了,狗熊就笨拙地抱着蜂蜜走了。还有监控拍摄到狗熊一家三口在森林漫步的温馨画面。山上的猴子成群,经常到村民家拿东西吃,有时看见村民提着食物,猴子抢了就跑,跳上屋顶,把篮子翻个遍,喜欢的马上塞进嘴巴,不喜欢的就从屋顶撒下来,像一个顽劣的孩童。有人说,晚上睡觉不要打开窗户,一不注意,猴子就会爬进房间觅食……其实,山中几天,我们已经与很多动物打过照面了:在桐木关公路上遇见穿过马路的鬃羚;白鹤也很悠闲,不太惧人;在三港的桥上几次与猴群亲密接触,小猴抱着树干嬉戏,几只大猴蹲坐桥墩石凳,啃吃着游人投食的水果饼干。

武夷山人有句口头禅,吃茶去。离开桐木村,在武夷山核心景区九曲溪畔,路过武夷精舍时,我听见,精舍的主人朱熹在招呼我,吃茶去!温和中庸的声音,引导我进了朱熹园,只见朱熹立于精舍门前,正在拱手迎客,一卷书,一杯茶。我便吃了一杯茶,茶味醇厚,甘滑爽口,有种特殊的高山韵味,我就真真的将茶叶吃了,细嚼慢咽,吃出了桐木村的野趣,久久回甘。

曾在正山堂的墙壁上读到19世纪初英国著名诗人拜伦《唐璜》诗中一句:“我觉得我的心儿变得那么富于同情,我一定要求助于武夷红茶。”又想起,朱熹赋予武夷茶以思想,“建茶如中庸之为德,江茶如伯夷叔齐”。大概是我在桐木村求助过武夷红茶,归来便觉得自己也变得富于同情、中庸起来了。



回原因

古都北京的暑天,溽热难耐,于是驱车前往北京植物园避暑,在入伏的第三天。

进入香山脚下的这处园林,迎面有一条林荫道沿郁郁山岭逶迤起伏。一路走去,湖池潭泉错落于远近,繁花异卉忽闪在身旁。有清风拂面,有凉意入怀,怎一个“爽”字了得。

谁与话清凉?在流连中前行,一块路牌悄悄提示,前方的浓绿里有梁启超的墓园可供瞻仰拜谒。这样的不期而遇怎能辜负?顺着路牌的指引走,就看见山道一侧,矮石墙环围出了一块林地,一方墓园坐落在其东部。墓园背倚西山,坐北朝南,北高南低,四周松苍柏翠,是由梁启超之子、中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的。

梁启超及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在墓园的北部平台上。墓碑、墓顶及供台衬墙均采用花岗岩雕筑,前后连接,浑然一体。墓碑没有碑文,也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,这是梁启超生前的意愿。

梁启超既是中国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政治风云人物,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结者,也是一位新思想新文化的启蒙者与拓荒者。他57岁即与世长辞:不是死于刑场,如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,更不是死于战场,像黄花岗的72位革命党人,但他的死也颇为悲壮。

1926年初,梁启超因尿血症久治不愈,不听当时还不信任西医的朋友们的劝说,毅然住进北京协和医院。那时候,西医在中国立足未稳,国人对他还将信将疑。梁启超却以罹病之身就之、试之,此举似有病急乱投医之嫌,但读他24岁时发表于《时事报》的《医学善会叙》一文,知道他并非一时心血来潮。早在那时,他就对中医队伍中一些因循守旧的庸医发出了质疑。他在文中说他们“全体部位之勿知,风土燥润之勿辨,植物性用之勿识,病理名目之勿谙”,深感“悬性命决生死于此辈之手,此何异屠腹饮鸩自戕”,呼吁中国医学除了要“措心于中国医学及古医学,讲求钻研”外,也应“探悟新理……读海外之书,广集思之益”。也就是说,他年轻时就期盼并倡导传统医学向现代医学迈进。

然而事与愿违,他在协和医院接受肾脏切除手术时,却不幸被误切了健全的右肾,只留下一枚“坏肾”来维持他虚弱生命的供给。

这是一次严重的手术事故,主刀者却是毕业于哈佛大学的医学博士、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,其助手也是声名赫赫的美国外科医生。这样的结果,自然引起了一片哗然。梁启超的学生陈源、徐志摩等人挺身而出,以“白丢腰子”(徐志摩语)为由,通过媒体对协和医院进行口诛笔伐、兴师问罪。

然而,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作为受害者,梁启超摆摆手,不但不状告院方、不提赔偿要求、不要医院道歉,还阻止陈源、徐志摩的抱打不平。

更让人错愕的是,他还让人搀扶着下床,于灯下颤颤巍巍写就《我的病与协和医院》一文。在这

数次停笔泣不成声。这篇文章也许就是因为写出了——一个儿子对母亲最深厚的情感和刻骨铭心的思念,而最终获得了一等奖。不止于此,回想起来,我获奖的诗歌、散文、杂文、歌词等作品多是在怀有真情、激情、深情时创作出来的。

三、勇于创新是在文学之路上保持不掉队的要义。

文学创作要踏着时代的节拍前进。创新是文学的生命力,因为它能经常提醒作者尽量不要用老观点、老语言去写作,尽量写出一点别人心中所想、别人笔下所无的新东西来。我从50年代开始写作以来,常因创新而受到批评批判,但我并不后悔。至今我仍然坚持走创新之路,否则读者就不买你的账。当然,新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东西,因此既要敢于创新,又要善于吸取教训,不断改进,这样才能与时俱进,不易掉队。

四、敢于追求是行进在文学路上的驱动力。

我虽然写作了几十年,但不敢说我已登上了文学殿堂,我总怀有作为草根在文学艺术上的不足感、紧迫感、恐慌感,但也本着“志当高远”的信念,在心里为自己确立了三个追求目标——追求超越、追求经典、追求永恒。我想,我这辈子恐怕实现不了这三个追求的目标了,但几十年来从不放弃,从不气馁,从不敢懈怠懈怠。为此我总是没年、没节、没星期天地苦斗,我的格言是“学习是生命的奠基石,苦斗是命运的救生圈”。我把自己当作一个蹩脚的足球运动员,只要我不停地追“球”,也许有一天就能将球射进球门。

我至今仍在文学之路上行走着。平心而论,我的文学之路是不算成功的。我爱好的文艺门类过多,几十年来在这方面我是“热热闹闹,乱七八糟”,付出代价不少,却没什么专长。因而我希望爱好文学艺术的青年朋友们,能从我的文学之路上借鉴一些经验、吸取一些教训,从而走出适合自己特点、成功的文学之路来。

篇1926年6月2日刊发于《晨报副刊》的文章中,梁启超先肯定协和的医疗是有效的,又说:“出院之后,直到今日,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,病虽然没有清楚,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。”对于手术的施行,梁启超则说,“右肾是否一定该割,这是医学上的问题,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。”

他为什么要强撑着病体为协和医院开脱呢?

“凡世界文明之极轨,惟有医事,无有他事。”也是在《医学善会叙》中,他曾这样写道。可以看出,他认为医药一脉,兹事体大,甚或神圣,不可轻率非议,更何况是对他一直视为科学的代表的西医。

也许在内心,他认定自己手术的失败只是一种偶然而非必然,只是一件个案而绝不能代表西医外科的全貌。他也深知自己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,话语行为举足轻重。如果因个人手术的失败而让现代医学声誉受损,进而影响其在中国的普及,这是他所不愿意的。

至于生死,31岁时他就有着自己的思考。在《新民》第59号、第60号上,他发表过《余之生死观》一文。文中他提出了“小我,我之个体”“大我,我之群体”的概念,并说,“死者,吾辈之个体也。不死者,吾辈之群体也。……我之家不死,故我不死;我之国不死,故我不死;我之群不死,故我不死;我之世界不死,故我不死。”而“常情莫不贪生而避死,然生终未闻以贪而能常,死终未闻以避而能免”,“明知其不能常、不能免,而贪焉避焉者,则人类志力薄弱之表征也”。他不屑做“志力薄弱”的人,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声誉,他隐忍“小我”之伤损,不贪“小我”之生,选择把打落的门牙往肚里吞,以扬科学存正道而利“大我”。

不久,梁启超病情转重,再度入住协和医院,此时的他,生命之火已油干薪尽,医院也回天乏术,只能听任死神砰砰叩击梁府大门那个怪兽状的铜环了。

1929年1月19日,这位中国当年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人物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,噩耗传出,学界政坛天下同悲,痛斯人之不再。

为了现代医学在古老的中华落地生根、开枝散叶,梁任公不顾自己遭受的痛苦,不惜掷出生命的筹码进行维护。这样的死,何其特立独行,何其胸怀广远!

在松柏撑起的一袭沁凉里徘徊,耳畔蝉鸣如泣如诉。忽然想到了海子的诗句:“万人都要将火点燃/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/此火为大/开花落英于神圣的祖国……”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位把“火”高高举起的人。令人高兴的是,如今,西医已像中医一样,成为国人穿越病痛黑暗掌在手中的一支火炬。

翻过历史的一页,时光变换着人间风景。不远处,有人在打羽毛球。起跳、扣击,跃动的身影,那么矫健。而支在青葱草地上的一顶彩色帐篷里,传出了孩子欢快的笑声。

浓浓的绿荫中,一座墓莹静静地伫立。

